

目的·目标·功能：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维论析

王富军^{1,2}

1.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2. 大庆师范学院 大庆精神研究基地, 黑龙江 大庆 163712

摘要: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根本目的、战略目标等重大问题。党的自我革命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通过保持政党-国家-社会三重关系的动态平衡,更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党的自我革命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的辩证统一为核心,构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协同、内外监督贯通、纪法衔接的制度体系。党的自我革命价值功能在于,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整合意识形态、促进思想解放、巩固政治合法性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实现政党治理价值理性的系统性重构。

关键词: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历史周期率;价值功能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5.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5-0008-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52}我们党反复重申自我革命的重大命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动因。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具有历史纵深感,其破解之道在于回归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

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2]12}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抉择,既根植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无产阶级政党要经常自我批判的理论基因,又回应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政党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新时代以来,随着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组织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执政环境的日益复杂,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怎样防止权力腐败与滥用,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收稿日期:2025-02-04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别委托项目(23LLDJA007);安徽省重点教学研究项目(2023jyxm0864)

作者简介:王富军(1995—),男,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大庆精神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

以及实现长期执政等大党独有难题^[3],这些都成为摆在全党面前亟待应对的现实挑战,凸显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现实紧迫性。从理论溯源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自我革命基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时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加强自身建设实践和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更新,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进程中,要时刻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不断变革与完善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多聚焦于自我革命的历史叙事、内涵解读或路径探析等方面,为全面理解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互动机制和辩证关系缺乏系统性阐释,对“两个答案”的辩证统一关系论证不足,对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功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分析。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系统性视角出发,立足于“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战略目标和价值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党的自我革命目的-目标-功能的完整分析框架,通过政党适应性理论揭示党的自我革命的运行逻辑,以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意义。

一、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自我革命,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4]。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为对伟大社会革命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在于其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主体自觉。自我革命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战略部署,本质上是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问题的时代回

应。作为政党自身治理的元问题,党的自我革命通过调整政党功能结构、重构政治关系,最终实现对社会变革方向与进程的有效驾驭。

1. 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辩证统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5]。社会革命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和自我革新的能力,这就要求党必须通过自我革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适应社会革命不断变化的需求。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6]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历程验证了这种辩证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破除教条主义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巩固了大生产运动的实践成果,为抗战胜利后的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进程提供了思想指导。新时代以来,反腐败斗争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中国共产党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新,持续破解“塔西佗陷阱”与“诺斯悖论”交织的治理困境,党的自我净化能力对社会治理效能有着明显的正向反馈和传导作用。反之,党的自我革命也离不开社会革命的实践检验。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我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7]393}。党的自我革命是党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着重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而社会革命是改造社会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旨在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的根本性变革。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主体范畴虽然存在差异,自我革命以党组织为实施主体,社会革命依赖多元主体参与,但是二者也存在相通之处:目标具有同构性,共同服务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动力具有同源性,均根植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方法具有互通性,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8]。因此,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论框架下形成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自我革命聚焦于政党组织的内在否定性,社会革命则作用于社会形态的外在否定性。方法论层面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破除教条主义等实现思想路线的自我矫正,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等组织机制的自我净化,不断消除政治上层建筑中滞后于经济基础发展的要素,从而为社会革命扫清制度障碍。二者的互动体现为主体自觉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运动,既遵循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原理,又凸显政党主观能动性的特殊价值,最终在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中实现历史进步。

2. 党的自我革命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4]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遵循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我革命实践,始终以服务党的中心任务为逻辑起点。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回应时代课题的适应能力,而党的自我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功能调适的核心机制。不同历史阶段,党的中心任务虽然有所不同,但自我革命始终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核心指引。党的历史任务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推进现代化建

设,再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任务重心的转换要求党不断突破路径依赖与思维定式。延安整风运动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使党能够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为更好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改革开放等扫清认知障碍、奠定思想基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清除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央八项规定构建了“亲”“清”政商关系、重塑了党内政治生态,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政治保障。这些自我革命实践,本质上都是通过消除党内与党的中心任务不相适应的要素,确保党的工作能够始终锚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在此过程中,党的自我革命既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党在特定历史阶段政治纲领的必要手段,以此确保将党的政治势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治理效能。

3. 政党 - 国家 - 社会三重关系动态平衡

政党 - 国家 - 社会的关系,是现代政治体系中无法回避的话题。政党作为政治组织,通过掌握国家政权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同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依赖于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间张力关系的制度化调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推进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加强党的建设。”^[9]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实现的嵌入式调适,构建起三者的动态平衡机制:在政党 - 国家维度,通过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完善民主集中制和党组制等方式,确保政治决策的科学性与执行力;在政党 - 社会维度,依托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和途径,实现社会诉求向政治议程的有效转化;在国家 - 社会维度,借助宏观调控、公共服务供给等职能履行,维系市场逻辑与公共价值

的动态平衡。这三重关系的调适并非静态均衡,而是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机制等持续的制度创新、基层党组织功能强化等组织革新,在保持政党核心地位的同时激发国家机器的治理效能与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最终形成政党引领—国家治理—社会参与的协同发展格局。新型政党制度也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动态调适的重大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70多年来,之所以能够不倒不败,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关键在于既能够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保障国家一体,又能够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而保障社会多元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在国家一体与社会多元之间建立有机平衡,实现整个国家的多元一体^[10]。

二、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目标:跳出历史周期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4]。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命题,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既是对传统政治文明中政权兴衰规律的批判性超越,也是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党适应性规律的深刻把握。

1. 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深层政治哲学意蕴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访问延安,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促膝长谈,史称“窑洞对”,黄炎培先生最早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这一概念。黄炎培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历经兴衰更替,往往在初期能够励精图治、蓬勃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陷入

腐败、衰落的困境,最终走向灭亡,形成了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历史周期率作为政权兴衰的周期性现象,根植于权力运行的内在矛盾。中国封建王朝更迭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规律,揭示了权力私有化、官僚腐败与民众离心力的恶性循环。“窑洞对”的深刻性在于,将这一历史现象上升为现代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终极追问,即政治组织如何避免从历史工具异化为利益主体。苏联解体的教训进一步凸显问题的现代性——当政党丧失自我革新能力,权力垄断导致代表性断裂时,党的领导逐渐被削弱,党的建设逐渐放松,思想逐渐保守僵化、体制机制逐渐固化、诸多顽瘴痼疾缠身,特别是特权思想与特权行为引发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腐败之风、奢靡之风、享乐主义严重影响了政党的形象和公信力,民心尽失,最终没能跳出历史周期率^[11],引发政治系统的崩溃。

在政治哲学层面,历史周期率问题反映了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本质上是权力“二律背反”的具象化:公权力的公共属性与行使者的私利倾向之间的张力。卢梭的公意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公仆思想,都曾试图破解这一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必须有制约和监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古今中外都证明了的一个道理”^{[1]388}。如果权力运行脱离有效制约和监督的轨道,滥用风险大幅攀升,导致统治阶层与民众利益脱节,进而引发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可能导致政权更迭的历史变局。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的陷阱,保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一个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2]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对权力异化难题的创造性回应——通过主体自觉的内在革命而非被动依

赖外部革命,实现权力本质的复归。这种解决方案突破了传统权力制衡范式的局限,将制度约束升华为价值自觉,形成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

2. “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的统一

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思考。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又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一重要理念。从时空场域来看,民主新路强调外部监督的倒逼作用,侧重于从外部监督层面来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体现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伦理,从陕甘宁边区“三三制”到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党通过人大代表联络站、基层协商议事会等机制,确保权力运行始终处于人民监督之下。而自我革命则更强调党从自身内部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聚焦理想信念和思想领域,自我完善聚焦制度体系,自我革新聚焦政治生态,自我提高聚焦执政本领。二者的时空转换体现为,在政权初创期侧重外部监督防止蜕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内生动力保持先进,形成监督维度的历史辩证法,本质上都是为了确保党和国家权力的正确运行,实现长治久安。

外部监督与内部净化构成外源性压力与内源性动力的共生系统。人民监督作为外源性压力,能够对党的权力运行形成广泛的外部约束。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等方式,人民群众能够对党的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而自我革命作为内源性动力,是党自身基于对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对党的初心使命的践行,主动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2]44}只有将人民监督的外源性压力与自我净化的内源性动力协同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有效防止权力腐败,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3.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制度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2]32}。思想建党强调通过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将主题教育常态化,先后通过多次主题教育筑牢了信仰根基。制度治党则侧重于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规范党员行为,强化制度执行,借助不断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形成刚性约束。二者的协同能够从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保障,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治理哲学,构建起价值引领与行为规制的闭环体系,使党员在思想上不想腐、在制度上不能腐。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具有预防功能、监督功能、纠错功能和激励功能,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不仅为党内治理提供了系统的框架,还为党的自我净化、提高治理效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

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54}。党内监督是党的自我监督的重要形式,通过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党内巡视巡察等机制,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党外监督则包括人民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有机统一起来,能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使党内事务和权力运行更加透明,便于党外监督主体参与监督;同时,加强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提高监督效率。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的规章制度,国家法律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建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机制,能够确保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衔接,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7]70}。一方面,党内法规的制定要符合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能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另一方面,对于违反党内法规且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通过这种衔接机制,既强化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又维护了国家法治的权威。在实践层面,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建立了问题线索与办案成果同步移交的“双移送”机制,这种衔接机制既防止纪法断层,又避免以纪代法,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三、党的自我革命的功能意义:管党治党的价值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14]588}。因此,党的自我革命作为党的政治系统的“自我完善”,其价值功能不仅体现为组织机能的优化,更深层次地指向

政党价值理性的重构。这种价值逻辑的展开表现在整合意识形态、促进思想解放、巩固政治合法性和优化政治生态四个维度,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供了价值坐标与实践范式。

1. 党的自我革命整合意识形态功能

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5],“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6],因此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都应从现实的社会存在中寻找物质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支撑,“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17]100}。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主流话语侧重于革命叙事,强调阶级斗争、武装斗争等,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随着时代的发展,党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主流话语也逐渐从革命夺权的斗争话语转向长期执政的治理话语。新时代党通过自我革命,能够及时调整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使主流话语更贴合时代需求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比如,以“中国梦”叙事整合阶级性与民族性诉求,这种转型在脱贫攻坚中体现得最为真切,具象化为精准扶贫的政策话语,既继承群众路线传统,又融入精准治理的现代理念。同时,党的自我革命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18]5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

中体现,能够凝聚党的自我革命的共识。首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5-36}。党的自我革命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的发挥,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使“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9]135},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其次,我们党通过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和文化建设项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凝聚力。我们党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就明确了崇廉拒腐的价值导向,使意识形态建设实现了从理论灌输到制度规约的升华。再次,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网络舆论场的复杂多变等诸多挑战。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提升党应对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20]。“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7]118}整治不良网络舆论,阻断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渗透路径,维护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安全。

2. 党的自我革命促进思想解放功能

思想解放是打破既有认知状态,其本质在于通过把握“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实现价值理性跃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2]20}。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

内逐渐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可能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阻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和改革观,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认知局限,推动党员干部的认知革命。通过自我革命,克服部分干部对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抵触情绪,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反腐败斗争“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14]51},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进程的阻滞。监察体制改革中留置取代“两规”的制度创新,既是法治化突破,更是对特权思维的革命性否定。“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14]559}

党的自我革命并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严管与厚爱结合,为犯错误划定边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7]440}。“三个区分开来”原则界定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划定了试错边界,党的自我革命在完善容错机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通过自我革命,能够准确把握改革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与错误的界限,为容错机制提供更科学的判断标准,使容错机制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这有利于激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氛围。

党的自我革命促进思想解放的目的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将个体理性转化为集体行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净化完善,更在于以党的自我革命带动整个政治权力体系的变革,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系统化的自我革命政治^[21]。这种“破立统一”的思维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持续的思想动能。解放思想是打破旧有观念束缚、推动改革创新的重要手段。党的自我革命通过促进思想解放,使党员干部摆脱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以更加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看待和解决党内党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22],使全体党员干部在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达成共识。通过自我革命,党能够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将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来,统一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8}的中心任务上来,进而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发展合力。

3. 党的自我革命巩固政治合法性功能

人民主体性地位的制度保障维护了政治合法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196}。党的自我革命不仅在于完善党内各项制度,更在于以党的制度完善带动国家制度更新,保障人民的合法主体地位。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使人民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管理,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从制度层面巩固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绩效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的双重供给增强了政治合法性。绩效合法性是指党通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实际业绩来

赢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比如,脱贫攻坚战使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就是绩效合法性的有力彰显。党的自我革命能够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为绩效合法性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党通过自我革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价值层面赢得人民的认同,比如,抗疫斗争中生命至上原则的确立,将工具理性升华为价值信仰,这就是价值合法性的有力彰显。

危机应对中制度优势的具象化呈现巩固了政治合法性。我们党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各种危机的过程中,迅速反应、科学决策,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通过高效的组织协调和资源调配,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应对危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到全国一盘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一线、向群众身边延伸”^[23]。“全国一盘棋”的体系使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感知的治理效能。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制度优势得以具象化呈现,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巩固了党的政治合法性。

4. 党的自我革命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8]67}。政治生态是政治主体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状态,是一个政党生命力的根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9]181}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坚决反对和抵制厚黑学、潜规则等各种腐朽思想和庸俗文化的侵蚀,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文化基因,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通过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文化

氛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既具有自我革命的特性又具有精神文化的属性^[24],《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将红色文化融入党内政治生活。我们党通过开展廉洁文化建设活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使廉洁文化深入人心,从文化层面优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通过规范“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党内政治生活形式,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确保党内政治生态健康有序,“坚决防止和克服党内政治生活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倾向”^{[7]803}。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历史性发展,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关于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思想,赓续了中国共产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这一理论创新不仅重塑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认知范式,更是在实践维度上构建起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的系统方案,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超越西方政党政治困境的中国智慧。首先,党的自我革命实现了理论范式的创造性转换。党的自我革命立足于革命党、长期执政党、使命型政党等党的多重角色,将马克思主义矛盾论中否定之否定规律具象化为政党适应性改革的方法论,将中国共产党先锋队理论发展为“四个自我”的实

践机制,将毛泽东“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思想升华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种理论飞跃的本质,是把“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构建起涵盖价值信仰、制度规范、实践路径的完整理论体系,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有效避免了政治组织长期执政异化这一世界性难题。其次,党的自我革命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2]177},党的自我革命发挥着政治保障系统的核心功能,它通过思想解放破除观念梗阻、通过制度创新疏通治理堵点、通过权力监督防控蜕变风险。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与事业发展高度相关,只有通过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次,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党的自我革命道路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神话。与西方的多党轮替导致的政策短视相比,中国共产党通过内生性的自我革命实现良性健康发展;与西方的议会党团碎片化博弈不同,我们党依托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始终保持着战略定力。这种新型政党治理范式的确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自主性政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党的自我革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政党治理之路,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3] 王富军. 大党独有难题的外在表征与破解之道[J]. 思想理论战线, 2024(4):19-28.
- [4] 习近平.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J]. 求是, 2024(24):4-7.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1.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43.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242.
- [9] 习近平.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6.
- [10] 肖存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多元一体研究: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1):82-91.
- [11] 蒲传新. 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基本经验及其现实要求:以三个“历史决议”为中心的考察[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1-10.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611.
- [13] 王富军. 政党治理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结构与功能[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4):39-48.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29.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 [20]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24.
- [21] 皇甫鑫, 陈国权. 自我革命政治与功能性分权理论[J]. 学术月刊, 2023(9):68-76.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J].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38.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725.
- [24] 俞晓婷.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育人功能及其实现[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11):47-50.

[责任编辑:侯圣伟 聂海杰]



引用格式:王富军. 目的·目标·功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维论析[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5):8-17.